

民国时期对朱子仁学的阐释*

乐爱国**

【摘要】民国时期，朱子仁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持续深入的发展过程。有不少学者作了阐释，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相关著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1）朱子《仁说》的形成及其与程颢仁学的关系；（2）朱子对“仁”的阐释；（3）朱子仁学思想的发生、发展。民国时期对朱子仁学的研究，不仅是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应当成为当今朱子学研究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民国时期；朱子；仁学 《仁说》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2-0124-06

朱子的思想多被指称为“理学”，而事实上，朱子对“仁”作过深入的阐释却往往被忽视。对此，陈来指出“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朱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从两个基本方面来呈现：一个是理学，一个是仁学。从理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哲学，是我们以往关注的主体；从仁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思想，以往甚少……说朱子学总体上是仁学，比说朱子学是理学的习惯说法，也许更能凸显其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①然而，在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中，朱子的仁学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和探讨，但却一直未能被今人所提及。对此作一叙述，或许有助于当今对于朱子仁学的理解和研究。

一、概述

民国时期对于朱子学的专门阐述，可以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的第三期“宋明理学时代”第九章“朱晦庵”。该章分“小传”、“理气”、“性”、“心情欲”、“人心道心”、“穷理”、“养心”、“结论”等节，专门论述朱熹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但其中并没有对朱子仁学作出阐述。

1916年出版的谢无量《朱子学派》是民国时期第一部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学术著作，该书第二编“本论”分为“朱子哲学”、“朱子伦理学”、“朱子教育说”、“古今学术评论”等章。其中第二章“朱子伦理学”，有“仁说”一节，专门探讨朱子

仁学的思想来源以及基本内容。

1927年，黄子通发表《朱熹的哲学》，分为“宇宙论”、“论性”、“论仁”和“论修养”四节，其中“论仁”又分为“仁与四端”、“仁与爱”两小节，对朱子仁学作了简要的阐述。

1928年出版的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在阐述朱熹教育学说时，分为：（一）“宇宙论”，（二）“性论”，（三）“仁说”，（四）“论心性情欲”，（五）“论教育”，（六）“结论”；其中“仁说”一节，专题讨论了朱熹的仁学思想。

1929年出版的周予同《朱熹》中的第三章“朱熹之哲学”，分为“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三节。其中第二节“价值论”中有“伦理哲学”一小节，又分“性论”、“心论”和“修养论”；“修养论”包含了对朱子仁学的阐释。

同年出版的贾丰臻《宋学》有“朱子”一章，分为（一）哲理说、（二）心性说、（三）修为说；其中在阐述朱熹心性说时，对朱熹仁说作了讨论；并附《朱子语类》卷105所载“仁说图”，又引朱熹所言加以说明^②。

1930年刊印的唐文治《紫阳学术发微》，该书卷4“朱子论仁善国发微”引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7《仁说》以及卷31《答张敬夫（六）》、卷57《答陈安卿（三）》、卷38《答袁机仲（五）》、卷46《答胡伯逢（四）》、卷74《玉山讲义》，并作阐释，最后还附文《唐文治读朱子〈仁说〉诸篇》，对朱子仁学做了深入的探讨和发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12JZD007）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乐爱国，浙江宁波人，（厦门361005）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陈来《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44页。

② 贾丰臻《宋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02—104页。

挥。

1932年,嵇文甫发表《程朱论仁之阐略》,分为“绪论”、“程朱思想之背景”、“程子之论仁”、“朱子之论仁”、“程朱论仁之比较”、“结论”六节,具体分析朱子对“仁”的阐释及其与程颢的差异,以及殊途而同归。

1933年出版的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中的第十二章“朱熹之综合学说”分“宇宙论”、“心性论”、“行为论”、“政治论”、“教育论”等,其中“行为论”有“仁说”一小节,阐述朱子《仁说》的仁学思想。

1937年,郭毓麟发表《论宋代福建理学》,其中在阐述朱熹理学时,分“太极及理气二元论”、“性说”、“心说”、“致知与力行”、“修养法”,而在述朱熹“心说”时包含了对朱熹仁说的讨论。

同年,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的第五编第二章“宋明儒家思想的概要”,在阐述朱熹哲学时,从伦理学的层面阐释朱熹仁学。张岱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大纲》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人生论”第三篇“人生至道论”第六章“与理为一”,包含了对朱子仁学的探讨。

1946年,孙玄常发表《朱子〈仁说〉疏证》,对朱子《仁说》文本作了详细的注释和解说,并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2《答张钦夫论仁说》四篇。

1947年出版的李相显的《朱子哲学》是民国时期最大部头的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学术著作,该书对朱子哲学的诸多概念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作了动态的阐述,分为“道”、“理气”、“性理”、“伦理与政治”、“工夫”等编。其中第三编“性理”,分为“性”、“心”、“四德”三章,“四德”章又分四节,即“五常与阴阳五行”、“性之条目”、“仁为天地生物之心”、“仁包四德”,对朱子仁学的主要概念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作了详细的阐述。

显然,在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中,包括了对于朱子仁学的探讨,并出现过一些有关朱子仁学的专题论述。但是又必须指出,在一些影响较大的中国哲学史通史类著作中,对于朱子哲学的阐述几乎没有涉及朱子仁学。谢无量虽然在《朱子学派》中对朱子仁学作了阐述,但在其稍后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第三编上第十一章“朱晦庵”分为“太极及理气二元论”、“性说”和“修养之工夫”

三节,其中并没有讨论朱子仁学。1929年出版的钟泰《中国哲学史》,第三编第八章“朱子”分为“理气”、“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居敬穷理”三节,也没有包含对于朱子仁学的阐述。1934年出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被认为是“当时水平最高的一部中国哲学史”^①,尤其是,其中对朱子哲学的阐述,“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②。该书第十三章“朱子”分为:(一)“理、太极”,(二)“气”,(三)“天地人物之生成”,(四)“人物之性”,(五)“道德及修养之方”,(六)“政治哲学”,(七)“对于佛家之评论”;其中也并没有论及朱子仁学。当然,这并不能否定民国时期确有不少学者对朱子仁学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

二、基本问题的研究

民国时期对于朱子仁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1)朱子《仁说》的形成及其与程颢仁学的关系;(2)朱子对“仁”的阐释;(3)朱子仁学思想的发生、发展。

1. 朱子《仁说》的形成及其与程颢仁学的关系

朱子《仁说》是朱子仁学的重要著作。关于该文的形成,朱子《仁说》指出“吾方病夫学者诵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离爱而言仁,故特论此以发明其遗意。”^③对此,朱子门人陈淳说:

自孔门后,无识仁者。汉人只以恩爱说仁。韩子因遂以博爱为仁。至程子而非之,而曰:“仁,性也;爱,情也。以爱为仁,是以情为性矣。”至哉,言乎!然自程子之言一出,门人又一向离爱言仁,而求之高远……殊失孔门向来传授心法本旨。至文公始以“心之德、爱之理”六字形容之,而仁之说始亲切矣。^④

唐文治《紫阳学术发微》引述并赞赏清儒黄式三(字薇香)所言“朱子虑仁道为禅所蒙,学者

^① 张岱年:《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文史知识》1999年第3期。

^②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载《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③ [宋]朱熹:《仁说》,《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67卷,《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280页。

^④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22页。

无以识仁，何由行仁，不得已而作《仁说》”^①。孙玄常《朱子〈仁说〉疏证》则引朱子《答吕伯恭书》所言“圣门学者皆以求仁为务，盖皆已略晓其名义而求实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会不得，则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识之物，复何所向往爱说而知所以用其力耶？”并指出“是朱子自述所以作此文之本意也”^②。

朱子《仁说》无疑是对程颢《识仁篇》的解说，对此，谢无量说“朱子既承明道之说，以仁为五常、百行之首，至善之源，而又远推本《乾·文言》之曰‘德’，《孟子》之‘四端’，故以信属于诚，以仁义智（义礼智）三者为统于仁，乃作《仁说》。”^③周予同认为，朱熹仁学思想的形成，“其远因固在孔子之仁说，其近因实受程颢《识仁篇》之影响”^④。范寿康也认为，朱熹仁学“远绍孔子的仁说，近承程明道的《识仁篇》的思想”^⑤。显然，不少学者都认为，朱子《仁说》与程颢《识仁篇》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诚如黄宗羲所说“朱子得力于伊川，故于明道之学，未必尽其传也”^⑥，朱子《仁说》与程颢仁学又多有差异。王凤喈认为，朱熹论仁，虽大致本之程颢，但特别注意生物之心与爱人之心，以爱为仁，而与程颢论仁的注重点各有不同，尽管实际上是一致的。^⑦嵇文甫《程朱论仁之阐略》认为，程颢受释老影响深重，其仁学“染有佛老之痕迹者”，而朱熹无须假借于佛老之教，只要“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造其其实”^⑧。但他又说“要之，二贤论仁，乃同归而殊途，皆有功于仁学者，本无所轩輊于其间”^⑨，认为程颢与朱熹在仁学上虽有差异，但终属殊途而同归，同源而异流。

2. 朱子对“仁”的阐释

谢无量认为，朱子以仁为天地生物之心，是要阐明“五常、百善皆自生意推之，同为一本所分”^⑩，所以，朱子讲“四德”，“亦自其形而上学推之。盖仁义礼智，犹春夏秋冬始皆自一气发生”，就如春夏秋冬之春，元亨利贞之元，心之初所发之仁可以统义礼智三者^⑪。与此同时，谢无量还具体分析朱子有关仁与恕、仁与公、仁与爱、仁与去私欲关系的论述，并且指出：

为仁不外一心。一心敦笃虚静，是为为仁之本。以敦笃虚静，乃能去私欲也。去私欲则公，公则仁矣。恕与爱二者，是仁之效。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此就“仁”字本义而言。若推而达之，凡礼义信智，及一切万善，何莫非仁之所统

乎？^⑫

黄子通认为，朱子讲“仁”，浑言之，则“仁”为本体，为实在，为天地生物之心，“仁”包仁义礼智；分言之，则“仁”为四德之一，“仁”是“爱”，为现象，为用。他还说：

朱子的“仁”，就是“爱”之理。“爱”则是“仁”之发。一则是性，一则是情。两者虽有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相通，各有攸属”……换言之，“仁”就是至善，不过这个至善，包含动静、体用，不是与人之知觉、情感绝不相干的东西。^⑬

周予同认为，朱熹讲“本体之化生万物，为仁德之表显”，意在“吾人得本体之一部分以生，则内心亦自当有仁德之存在”，而且，朱熹还以为“仁之包举义礼智，犹四时之春之于夏秋冬，乾德之元之于亨利贞，五行之木之于火金水”^⑭。

贾丰臻认为，在朱熹那里，“仁就是哲学上所说的理，人生哲学的性，就是绝对的性；故同时包含仁、义、礼、智；其未发而活动时，四德悉具；从这方面称为性的德，称为理，又称为仁；其已发后，仁为恻隐，义为羞恶，礼为恭敬，智为是非；这就是情，而爱能共通于四情”^⑮。贾丰臻对“仁”的阐释，后来在郭毓麟的《论宋代福建理学》中得

① 唐文治《紫阳学术发微》第4卷，《民国时期哲学思想丛书》第1编第88册，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第73页。

② 孙玄常《朱子仁说疏证》，《国文月刊》1946年第47期，第20页。

③ 谢无量《朱子学派》，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第127页。

④ 周予同《朱熹》，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27页。

⑤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第358页。

⑥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1册，第542页。

⑦ 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185页。

⑧ 甫文（嵇文甫）：《程朱论仁之阐略》，《尚志周刊》1932年第2卷第4—5两期合刊，第2页。

⑨ 甫文（嵇文甫）：《程朱论仁之阐略》（续），《尚志周刊》1932年第2卷第6—7两期合刊，第5页。

⑩⑪⑫ 谢无量《朱子学派》，第128页，第133页，第140页。

⑬ 黄子通《朱熹的哲学》，《燕京学报》1927年第2期，第298页。

⑭ 周予同《朱熹》，第27—28页。

⑮ 贾丰臻《宋学》，第100页。

到重述^①。

唐文治对朱子仁学多有阐释。朱子《仁说》对《孟子·告子上》“仁，人心也”作了发挥，对此，唐文治说“人而能仁，则其心生，而可以谓之人；人而不仁，则其心死，而不得谓之人。”^②同时，他又赞同朱子《仁说》“以爱之理而名仁”，反对“离爱而言仁”，指出：

仁者，爱情也，亦公理也。

朱子之言曰：“仁者爱之理”，离爱不可以言仁。斯言一出，而天下之爱情不泯矣……夫天地之所以不陆沉者，人心中爱情而已矣。

朱子之言曰：“扩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为体也。”又曰：“人或不公，则于其所当爱者，又有所不爱。惟公则视天地万物皆为一体而无所不爱。”斯言一出，而天下之公理不灭矣……夫世界之所以不销毁者，人心中公理而已矣。是故宋代虽亡，而朱子之学说，千古之人心，亦遂不亡。^③

嵇文甫认为，朱子论仁，“必先考校其体，而后综合其意义”，“不专以心为仁，而必以生物之心为仁也”，“且以生物之心为仁，是此心即具有仁之体也”；同时，朱子论仁之范畴，“则据《易》乾元坤元之德，而概括古来儒者部分论仁之意义于其内，尤复分别考校其体，及其与仁之关系”，“实与乾元坤元之德，吻合无间，其近切事理，已非泛言‘与天地同体’者所可比”，所以，“古来儒者部分论仁之意义，亦至此而集其大成”。^④

陈钟凡认为，朱熹《仁说》“以仁者通天地而贯万物，包四德而统四端，周遍时空，而专一心之全德者也”；而且在朱熹看来，“觉者仁之一端，爱者仁之迹象，公及无私然后可以见仁，四者并非仁之体也”^⑤。

范寿康认为，朱熹“不仅把仁放在一切德目的首位，而且以为仁包括义、礼、智，好像四时的春包括夏、秋、冬，乾德的元包括亨、利、贞，五行的木包括火、金、水、土一样；这是因为仁是本体，义是实现仁的手段，礼是实现仁的规则，智是实现仁的分辨的缘故。这样，他所谓仁实是伦理上最高的标准，‘求仁’实是修养最后的目标”^⑥。

张岱年认为，“朱子甚注重仁，以为仁是最高之道，最高的德；但他讲仁，注重心中天理流行之意”，所以在朱子看来，“仁即天地之‘生’的原则，（所谓天地之心即天地之主宰的准则之意）而乃人心之本来的性德；人只要克去私意，返于天理，便是仁”，“天理之内容即是仁义礼智，而仁可

以统义礼智，故天理实即是仁”。^⑦

孙玄常在朱子《仁说》的注释和解说中，对朱子关于天地之心与人物之心的关系作了阐释，指出“天地之心乃心之‘全体’，人物之心乃心之‘个体’，二者之关系，殆如‘月印万川’。”同时，对朱子关于心（人心）与性情之关系以及性情之“未发”（体）与“已发”（用）之关系作了论述，并且认为程子所谓“爱之发而名仁”与朱子讲“以爱之理而名仁”“本旨相同”，还说“盖程、朱既以情之未发为‘性’，而‘性即理也’，故仁既是性，即可言仁即是理”。^⑧

3. 朱子仁学思想的发生、发展

李相显《朱子哲学》第三编“性理”第三章“四德”将朱子仁学概括为四个方面：（1）五常与阴阳五行，（2）五常与人之心性，（3）仁为天地生物之心，（4）仁包四德；并详细论述了这四个方面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该书认为：

一、朱子关于五常与阴阳五行的思想，“始发见于其癸未三十四岁之《垂拱奏札二》”；据朱子四十八岁所撰《论语或问》、《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及《周易本义》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思想“至此时已完成”。^⑨

二、朱子关于五常与人之心性的思想，“始发见于其丙戌三十七岁《杂学辨》中《张无垢〈中庸说〉》”；据朱子四十八岁所撰《江州重建濂溪先生学书记》、《论语或问》、《孟子集注》及《孟子或问》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思想“至此时已成熟”。^⑩

三、朱子关于仁为天地生物之心的思想，“萌芽于杨方庚寅（庚寅朱子四十一岁）所录朱子之

① 郭毓麟《论宋代福建理学》，《福建文化》1937年第4卷第24期，第42页。

②③ 唐文治《紫阳学术发微》第4卷，第84—85页，第86页。

④ 甫文（嵇文甫）：《程朱论仁之阐略》（续），第1—3页。

⑤ 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19页。

⑥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第358页。

⑦ 宇同（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359—360页。

⑧ 孙玄常《朱子仁说疏证》，《国文月刊》1946年第47期，第20—23页。

⑨⑩ 李相显《朱子哲学》，北平：世界科学社，1947年，第484—487页，第497—501页。

语”，据程端蒙及周谔己亥（己亥朱子五十岁）以后所录朱子之语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思想“至此时已成熟”^①。

四、朱子关于仁包四德的思想，“萌芽于杨方庚寅（庚寅朱子四十一岁）所录朱子之语”，据杨道夫己酉（己酉朱子六十岁）以后所录朱子之语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思想“至此时已完成”^②。

三、学术价值

由此可见，在民国时期，朱子的仁学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从1916年出版的民国时期第一部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学术著作——谢无量的《朱子学派》，到1947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最大部头的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学术著作——李相显的《朱子哲学》，都包含着对朱子仁学的研究，可见朱子仁学的研究，在整个民国时期朱子学的研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遗憾的是，由于对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忽视，近年来的朱子学研究虽然出现了大量的论著，但诚如陈来所说，较多的是“从理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哲学”，“从仁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思想”则甚少；即使有一些关于朱子仁学的阐述，也未能立足于民国时期朱子仁学研究的基础上，甚至出现低水平的重复。任何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都是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是对前人学术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当今对于朱子仁学的研究，应当追溯和总结民国时期朱子仁学的研究成果，并对此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把握，从而建立起进一步研究的学术基础。

民国时期的朱子仁学研究，涉及诸多方面，既探讨朱子《仁说》的形成以及朱子仁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又具体研究朱子仁学思想的丰富内涵；既从本体论、心性论的层面分析朱子对“仁”及其与四德关系的阐释，又从伦理学的层面研究其关于仁与恕、仁与公、仁与爱、仁与去私欲关系的思想，从而把对朱子仁学的研究引向深入。而且在对朱子仁学的研究方法上，既有对相关文献的阐释和解读，又有深入的理论分析；既有仁学思想的动态阐述，又有对各种思想的异同作出比较，从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这些研究，不仅构成了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今天的朱子仁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民国时期的朱子仁学研究还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

第一，朱子仁学与理气论、心性论的关系问题。事实上，民国时期的朱子仁学研究，有些已经涉及对于朱子仁学与理气论、心性论关系的探讨，尤其是张岱年对朱子的仁与理的关系作了分析，李相显《朱子哲学》把朱子仁学纳入心性论的范畴加以阐述。但是，从总体看，这一问题的讨论还不够充分，特别是一些中国哲学史通史类著作并没有在朱子理气论、心性论的框架中展开对朱子仁学的论述。当今对于朱子仁学的研究，有些甚至仍然停留于谢无量《朱子学派》从伦理学层面上的讨论。因此，有必要回到民国时期的朱子仁学研究的发展轨迹，进一步对朱子仁学与理气论、心性论的关系做出深入的探讨。

第二，朱子仁学与其他各学派仁学的异同问题。朱子的《仁说》是针对二程门人误解二程的仁学而作，并且引起了深入的讨论；朱子的仁学与其他各学派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嵇文甫的《程朱论仁之阐略》不仅阐述朱子仁学思想，而且还就朱子仁学与程颢的异同作了比较^③，实开民国时期朱子仁学比较研究之先河。沿着这样的思路，就朱子仁学与同时代的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的异同进行比较，显然有利于对朱子仁学的更为深入的把握。如果进一步推展开来，就朱子仁学与孔孟以来各学派的异同进行比较，则可以进一步了解朱子仁学的思想来源、特点和影响，以及朱子仁学对于中国古代仁学发展的贡献和地位。

第三，朱子仁学体系的建构问题。民国时期对朱子仁学思想的发生、发展以及理论内涵的探讨，对于全面把握朱子仁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这一点出发，进一步研究朱子仁学与理气论、心性论的关系，分析朱子仁学与其他各学派仁学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完整建构朱子的仁学体系，这对于朱子仁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克服“从仁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思想，以往甚少”的偏向，才能凸显并还原朱子学的“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

（责任编辑 杨海文）

^{①②} 李相显《朱子哲学》，第514—517页，第526—531页。

^③ 乐爱国《民国时期嵇文甫对朱熹与程颢思想异同之辨析》，《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2期，第12—15页。